

积极开展新时期的民族调查工作

史 金 波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已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这一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实施。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求,民族研究所将把这项工作作为全所的重要工作。经过反复酝酿,将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选择20个以上不同民族的调查点开展调查,每个点以县、旗或县级市为基本调查单位,并深入到乡(镇)、村(寨)和企业、学校进行基层调查。这是一次适度规模的调查,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全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综合性民族调查。为此,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将要分期分批组织大批科研人员分赴各调查点进行调查,要用相当的财力、物力支持这项工作。那么,为什么在当前要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现状和发展调查呢?

首先,这是时代的要求。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尽管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8%,但总数却有9100多万人,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4%以上。由此不难想见少数民族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近些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而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居住的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这更突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又受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传统的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显现出民族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为了使少数民族地区适应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深入地、全面地、综合地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科学地总结几十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地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尽可能为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也会对今后若干年内、对下一个世纪的民族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我国在50年代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民族调查。1953年至1956年组织调查人员到14个省区进行以民族识别为主的调查。1956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已经或将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转变时期,对各少数民族进行较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详细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民主改革前的社会形态以及民主改革后的状况,已经成为当时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任务。50年代的民族调查是毛泽东同志倡议的,这项任务带有抢救性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关心,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民族调查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开始调查工作由人大民委负责组织,组成了8个调查组,对20个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当时调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几年内基本弄清各主要民族的情况,搜集并积累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为制定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重点是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所有制和阶级情况,并尽可能搜集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资料。1958年以后,全国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便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调查组增加到16个,未派调查组的省,由各省民委负责组织调查。参加调查的人员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这次大调查对于全面、科学地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正确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科学依据。这次大调查取得了巨大成绩,获得了丰硕成果,后来陆续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以及保存下来的大量调查资料,就是调查工作成绩的具体体现。这次调查受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及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调查所取得的材料,越益显现出其珍贵价值。

从那次大调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个春秋,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了巨大的进步。比如在西藏的农区过去使用简单生产工具劳动的农奴,现在不仅政治上翻了身,生产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多地区用拖拉机耕地,用科学方法培育优良品种,有的农户有了自己的汽车、拖拉机。生活上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不少家庭有了自行车、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彝族最大的聚居区四川凉山在1956年以前还是奴隶制社会,那里交通不便,进出十分困难,现在全凉山已经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成昆铁路纵贯其间,不仅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多年来还大力推行彝文,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原来还带有原始社会残余的民族,社会发展变化更大,前后对比,有隔世之感。但总的看来,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很不平衡,目前尚有1000多万人还正在解决脱贫问题,少数民族中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很高。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矿产、森林、水利等资源新的开发和利用,借助漫长的边界线进行对外开放和经济交流,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基础很脆弱的农业,搞好科技、教育兴农,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特别是加速能源、交通、邮电通讯事业的发展,培育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民族文化新的趋向,民族意识在当前条件下的表现和影响,宗教在新的条件下的流传特点和作用,在新形势下增强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与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今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代会上李鹏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核心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并强调指出:“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增强经济发展活力。”90年代是体制转换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到了一个重要时刻,有着良好的机遇,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少数民族地区处在重要社会变革时期,作为民族研究工作者,应该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民族地区,比较全面、系统地调查现状和发展情况,并认真研究,总结经验,尽可能提出对策和建议,以作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有关政策的参考。我们还要尽可能在五、六十年代进行过社会历史调查的地方布点调查,这样的追踪调查有利于积累系统的材料,有利于纵向比较研究,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提出和解决实际问题。由上可以看出,这一次调查工作是当前民族地区实际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是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这几年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欧的巨变和苏联的解体使世界出现了新的格局。民族发展、民族关系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问题,层出不穷的民族冲突往往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热点。有些民族问题又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众所周知,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进步很快,各民族之间关系融洽,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这说明我国的民族政策是好的,和世界一些多民族国家比较,就更为明显。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国际上,周边国家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以及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在敏感的民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为此,我们也应该深入地了解和掌握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促进民族发展和繁荣、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适时地进行民族调查也是时代的要求。

第二,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是一个面向各民族、面向民族地区、面向实际的学科。30多年来,民族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在新的时期应该提出新的任务,去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学科本身的发展。一般来说,一个学科要发展,应该体现出它的社会价值。如果一个学科总是停留在原来基础上,不能在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么它的生命力也就有限了。从民族研究工作来说,以往的民族识别工作,解放前、或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任务已经大体上完成了。当前应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提出新的调查研究任务,将要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现状和发展调查就是结合现实问题提出的新任务。

当前民族研究工作应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发展、民族关系等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对策研究作为重点工作。民族研究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科研单位,在民族研究工作方面应注重在理论性、综合性、战略性和系统性研究方面发挥作用。即将开展的民族调查完全符合这样的精神。从学科建设来说,这一项目的实施,既能发挥全面、系统、综合研究的能力,完成既定的科研任务,又能积累新的资料,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获取了大量民族研究工作所必需的资料。在其后的30多年中,有关政府部门、科研和教学单位,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这些材料。参加那次调查工作的单位以及调查人员的科研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那次调查的基础上获得的,或由那次调查的成果衍化而成的。可以说那次民族大调查对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起了决定性作用,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民族研究工作。现在,时代发展了,学科建设当然也要相应地发展。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就为研究工作准备了新的资料,提出了新的课题。从民族学科的建设发展考虑,应该适应新形势,了解新情况,掌握新资料,并进而设置新的研究课题,取得新的研究成果,把民族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民族研究工作要为民族工作服务,要为繁荣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服务,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民族研究的重点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民族研究的课题也不能总是老框框,老面孔。否则,学科就不能健康发展。学科建设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研究课题要有时代感。这次民族现状和发展的调查应是民族学学科建设重要的一环。预计这次调查的结果可以积累起一批我国少数民族80—90年代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系统、科学的资料,出版系列性调查报告,并可能由此产生一系列有新的建树的论著。这样,在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在民族学学科及其各个分支学科的建设上都会有较大的进展。作好这项调查工作,深入基层,取得第一手真实可靠的资料,可为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面向民族地区、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它也会像50年代的调查那样,对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民族研究产生决定性的良好影响,同时还可以丰富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学学科管理和民族调查的经验,使民族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些年来,民族研究工作在加强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到

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也在不间断地进行。但是我们在科研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具体实践中把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摆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从现实的需要和学科发展需要的高度去安排计划,调配力量,组织较大规模、有系统的民族实地调查,还是很不够的。当然,从上次民族大调查到这次调查有一个形势发展的过程,我们的认识和科研重点布局的转换上也有一个过程。现在应该是完成这个转变、投入到新的任务中去的时候了。

民族实地调查工作,是为现实服务的,也是为民族地区长远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它是目前学科建设所必需,也是为学科长远建设着想的。民族调查不是权益之计,不是短期行为,在整个工作中要贯穿科学、求实精神。民族调查的结果,还可以为基础理论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因此,民族调查从民族学科长远建设来看将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是培养人才,建设民族科研队伍的需要。民族调查是民族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每个从事这项工作人员的基本功。学术界都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实地调查是开展研究工作和培养人才所必需的。中国的民族学有开展民族调查的优良传统,并由此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学专家。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全国从事民族研究和教学单位的骨干,很多人都经历了50—60年代的民族调查。他们通过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逐渐把民族事业看成了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大事,在调查中学到了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通过调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丰富了调查经验,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很多优秀科研成果,有的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次民族调查。有的老民族研究工作者在谈体会时说,参加一、两年调查,终身受益。目前这批骨干有的已经离退休,有的即将离退休。现在,乘一部分参加过调查的业务骨干尚未离开岗位之前,请他们担任调查组的领导或主干,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通过民族调查实践,传授他们的业务知识和调查经验,为调查队伍树立艰苦奋斗、深入实际的优良学风,指导、帮助、带动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建设一支基础扎实、勇于实践、勤于思考、学风良好的民族研究队伍。

现在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有一部分人参加过民族调查,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参加过民族调查,特别是没有参加过系统、综合调查的经历。中、青年民族科研人员,可以通过这次民族调查,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发挥业务基础好、勇于探索、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特长,挑起新的民族调查工作的重担,在为现实服务和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科学实践中成为民族研究工作的骨干。我们相信,通过这次民族调查一定能培养出一支跨世纪的民族研究队伍。

我们对这次调查工作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制定好调查计划和调查提纲,作好调查前的培训工作,中期检查、评估工作和后期验收工作,使这次调查达到预期的效果。